

顧亭林學記

張舜徽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顧亭林學記

張舜徽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顧亭林學記

張舜徽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1/32 開·3 5/8 印張·1插頁·72,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200

統一書號：11106·33

內 容 提 要

顧亭林（炎武），是我國十七世紀的一位愛國思想家和活動家，也是清初著名的學者。本書概略地介紹了顧氏的治學精神、治學態度、治學方法及其學術淵源和成就。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顧氏的生平及其刻苦鑽研的治學精神。



顧 亭 林 像

序 言

近年来，經常遇着許多有志讀書的青年們，在面談或通信的当中，很謙虛懇摯地問到做學問的方法和步驟，特別是對於接受古代文化遺產方面，應從何處下手？首先必須具備一些什麼條件？這一類的問題，是他們喜歡提出的。我爲着避免抽象而空洞的回答，只得舉出歷史上治學範圍比較寬、成就比較大的學者們的事跡，來勉勵他們。儘管那些人物，是封建社會的或資產階級的學者，只要他們治學的方法和態度，有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我們都應舍短取長，作為自己做學問的榜樣。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亭林（炎武），便是我經常稱舉的一個。

有人懷疑到顧氏著述既以“音學五書”爲最專精，應該肯定他是一位傑出的音韻學家，為什麼後人談到清代的經學家、史學家、乃至金石學家，都離不了他？他一生專業，究竟是什麼？難道每門學問，他都很精通嗎？我認爲如果要弄清楚這一問題，首先在思想上必須明確兩點：第一，古人做學問，有他們的規模次第，不可拿今天的治學範圍，去衡量古人；第二，古代學者，又有專家和通人的區別，不可拿專家的尺度，去衡量通人。關於第二點，更有着重說明的必要。

從歷史記載中，看過去二千年間的我國學術界，可以肯

定从汉初以至清末，学者們做學問的風氣，有着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是博通的道路，一是專精的道路。專精的道路，在西漢時便是所謂“五經博士”之學。那時當秦火之後，幾部重要經典，大部分都殘缺不全，由於傳授的本子不同，於是解說也就不同。以致“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離乖隔，不合不公”，沒有方法可以統一起來。當時所謂專家——五經博士，事實上也非謹守師說，專研究一部書不可。這便替當時學術界帶來了兩種弊端：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謂局隘，便是此經不通于彼經，此說不通于彼說。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指出的：“挾恐見破之私意，無從善服義之公心”；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都切中了漢代專門經學家的病痛。所謂破碎，便是死板地從文字上作些繁瑣考證。西漢末年學者桓譚，在所著“新論”中說過：“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這是何等破碎的工夫！他們在治學方面，範圍既如此褊狹，深閉固拒，不肯接受其他的不同議論，對於解釋古書和說明問題，多出于主觀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錯誤，更談不上融會貫通了。

但是在兩漢時期的學術界，象司馬遷、揚雄、劉向、鄭玄這般人，便是走的另一道路——博通的道路。假使司馬遷沒有“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殊語”的本能，怎樣能寫成一部無所不包的“史記”？揚雄、劉向不是學識淵博，怎樣能校定天下群書（揚雄曾校書天祿閣，見“漢書”“本傳”）？鄭玄沒有融會各家經學的說法，怎樣能溝通古今文、重新替群經作

注解？这些人做學問的面本寬，和那般局限于專經研究的五經博士比較起來，知識領域，便截然有廣狹之不同，不是“儒林傳”所能範圍，所以他們在“兩漢書”中，都不列入儒林傳，而另有專傳。後世學者象宋代的鄭樵、朱熹，清初的黃宗羲、王夫之，都是走的這條寬廣的路。顧亭林在清初，和黃、王一樣，是一位博通的學者。

有人認為學貴專精，便在於鑽得深，鑽得透，對某些專門性的問題，確能說明其所以然，指出它的利弊得失，並有所發明或發現，對整個學術來說，是有利的。至於博通的人，雖涉及的面比較廣，究竟還多少嫌其空泛。我以為這種說法，僅看到問題的一方面，而沒有考慮到多方面。首先必須肯定學問博通的學者，由於治學範圍比較寬，知識領域比較廣，在分析問題時，能由一事物聯系到若干事物，由一種書聯系到若干種書，所以得出的結論，比較通方而無偏蔽。在某些專門研究的工作方面，實際已做了發凡起例、開辟途徑的工夫。替專精的學者們指出了研究方向和下手方法，這功績是不可湮沒的。即以顧亭林為例，他在研究古韻的過程中，不墨守前人成說，居然在宋人鄭庠所分古韻六部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這便激起了後來學者們深入鑽研的興趣，替三百多年來音韻學家開了一條路。這一研究工作的能夠深入展開，顧氏確起了承先啟後的巨大作用。其次，如顧氏重視金石考古的工作，也替後來史學工作者啟示了努力的途徑。由此可見，博通與專精，在過去學術界雖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但是彼此並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依倚，緊密聯系着的。

今日人們做學問，雖不必走過去學者博通的路，但是我

总觉得必須首先积累多方面的基本知識，才能談得上进行专精研究。假使常識不够充足，便馬上从事专精研究，随便哪一門學問，都是講不通的。即以整理祖國文化遺產而言，茲事體大，本不是淺嘗浮慕的人所能問津。如果沒有古文字學的基本知識，便去研究銅器和甲骨刻辭；沒有古器物學的基本知識，便去審定真贋，有所考証；都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至于學習本國歷史，上下五千年，典籍浩如烟海，牽涉的面太廣，應讀的書太多，假若基礎打得不好，連許多常見書都沒有讀過，便馬上想研究某一朝代的專史，也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事物總是彼此聯系，不可分割。昔人所謂“牽一髮而全身動”，表現在學術研究中，更為明顯。如果一開始便把範圍弄狹隘了，遭遇的困難必然很多。過去學者們教人治學，特別強調本末、先後、緩急的程序，並且提倡“由博返約”的研究方式，不是沒有理由的。

黃梨洲說的很好：“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留別海昌同學序”）這句話雖說在三百年前，却道破了三百年來學術界的通病！有些局隘的學者，以為自己從事专精研究，凡是不屬於這一專業的知識，我都可以不管。這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期的乾嘉學者們，便已伏下了這一病根。他們既高舉一面“漢學”的旗幟，人人想爭取以專門名家，不自覺地把學問範圍弄窄狹了。當時所引起的流弊，連平日替“漢學”張目的江藩，也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他在“漢學師承記”中指出：“自惠戴之學，盛行于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又說：“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于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

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于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見“漢學師承記”卷三、卷七）這却正確地反映了乾嘉學者們治學的真實情況（當時還是有少數的個別的學者是很博通的）。研究經學的，可以不讀史；甚至研究這部經典的，可以不理會另一部經典；這樣的局隘褊狹，如何推廓得開！在學術上自然引起了不好的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到今天還是有不少人感受着的。

近年來的學術界，特別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細至窄。於是研究先秦史實的，可以不熟悉秦漢以下的世系、大事；研究近代史的，只局限於百年以內史料的搜討。這樣替自己畫定了一個圈子，自然談不到多方聯繫，融會貫通了。在這種風氣下進行研究工作的人，既替自己的拿陋，找到了借口，掩蔽的方法，也更加巧妙。終身因陋就寡，滿足於點滴考證的小小成就，便涌現出許多缺乏常識的“專家”。在他們的寫作中，經常發現不應有的錯誤和笑話。這並不是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沒有投下很大的勞動，而只是把做學問的園地弄得太狹小的結果。我們試尋味黃梨洲在三百年前所說的話，真足以發人深省！

顧亭林和黃梨洲一樣，在學術研究方面，是不主張走窄路的。並且經常喊着“博學于文”的口號，用以自勵，並用以教人。這個“文”字，却包括得很廣泛。除掉一切用文字記載的書籍以外，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還指出：“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那麼，連平日生活實踐中的每一事物，都成為了應該學習的對象，所以他所強調的“博學”，本不限於讀幾句死書。這是何等闊大的規模！一個做學問的人，

必須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才能推廓得开，不至于象春蚕一般的以茧自縛。

一个人在学术上取得輝煌成就，一方面固决定于有闊大的規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恒惴无华；坚毅不拔的治学精神，作持久奋斗。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規模虽立得很闊大，也仍然会落空的。顧亭林一生，所以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固然由于能够經常开动脑筋，深入思考，發揮創造性的劳动，对各种学問，都有不少发明或发现。但在他具体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还有四个特点：

一、勤动手 表现在一生鈔書的成績，特別惊人。

既可帮助記憶，又通过提要鉤玄的办法，成为各种著述的底本。

二、勤动脚 無論在家乡或者旅居北方，总是經常出游。通过实地調查研究，来丰富自己的知識。并且把实际見聞和書本記載紧密地結合起来了。

三、善于支配時間 平居固然沒有一天不讀書，即在长途旅行期中，也还利用騎在馬上的時間，背誦过去讀过的旧書，不使片刻光阴虛度。

四、善于接納朋友 早年在江南，和后来北游期內，都特別注意論学取友，一生交游很广。在做学問方面，得朋友帮助之力也很大。

以上四点，可說是顧亭林一生成功的基本条件。三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值得我們学习。至于他平日老老实实，埋头鑽研的态度，不求速化，不慕近功，把做学問看成終身之事，这种恒心毅力，又是后世学者的絕好榜样。我之所以汲汲写

成“顧氏學記”，不是沒有深意的。

由于事物总是发展的，进步的。生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即就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研究歷代史實而論，當然不應該停留在顧亭林時代的水平。但是從學術研究的步驟來說，必先痛下苦功，積累知識，然後加以科學的鍛煉，使之條理化、系統化，才能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方法來加以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們今天對於封建學者和資產階級學者做學問的一些好的態度與方法，都應該接收過來。許多封建學者治學的忠實態度，從句讀開始，一点一滴，積累知識，來打好做學問的基礎。他們在這方面，既創造了許多方法和條例，自然不容忽視。只有在這一基礎上做好準備工作，再結合着科學的提煉資料和改造資料的手段，運用正確的觀點和立場進行分析批判，才能出現新的有用的研究成果，這是很顯明的事實。如果始基未立，徒然強調科學的鍛煉，仍然是空中樓閣，無濟于事。今天所以認定古人還有學習的價值，道理便在這裡。

顧亭林在論學方面，並不是沒有缺點。和其他封建學者一樣，為歷史條件所限，有些議論主張，不免流入迂闊。不獨他所提出的有關經世濟民方面的辦法，強調“法古用夏”，違背了社會進化的原理；即在討論其他學術性專門問題，也多有“食古不化”的毛病。例如他研究古韻，總算是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他在“音學五書序”中却說：“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他居然想把後世語音恢復到三代時的舊讀，這當然是不可能行通的事！這種看法，仍然是從“復古”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來的。象這一類的見解，

人們容易辨識其錯誤，用不着詳加批判，我在寫這本學記時，也就不必引入。

至于近人闡述顧氏學術思想的文字中，也有歪曲顧氏原文，以及與顧氏語意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也不敢曲從。例如顧氏談到整頓風俗，經常強調“清議”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清議”二字，明明是指社會的正直輿論。也就是認為群眾的批評力量很大，可以利用它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以補道德法律之所不及。所謂“一玷清議，終身不齒”，語意是十分明白的（詳見“日知錄”卷十三“清議”條）。近來看到侯外廬氏所著“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一書，談到這個問題，便肯定它是近代言論自由的“新民”思想。這便把“清議”的“議”，看成議論國家大事了，顯然是和顧氏原意有距離的。象這一類的問題，最好實事求是地用歷史觀點去仔細分析，以古人之見，還之古人，而不失其真。不必拿後起的新名詞、新術語，強加于古人頭上，以致違背了原來的意思。我在撰述這本學記的過程中，就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不敢于古人辭意之外，有任何不必要的附加。有些地方，還只得照古人原語介紹出來，留待讀者論斷。

“學記”這一類寫作的出現，發端于清儒戴望的寫“顏氏學記”。將顏習齋和李恕谷的言論，從遺書中輯錄下來，戴氏本人，幾乎沒有一句按語和考証，這是一種鈔書的體例。當時“顏李遺書”流傳不廣，人們不易看到他們的議論主張。戴氏本着闡幽表微的意思，將顏李遺言擇要鈔錄一遍，介紹給全社會，這在當時，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後來學者們知道重視顏李之學，大都是從戴氏書中受到啟示的。由此可見，

“學記”一類的寫作，對於介紹前人學術，啟辟後人途徑，效用是比較大了。

不過今日撰述“學記”，不必沿襲戴氏那種但事鈔錄，全無論斷的體例。相反地，應該將每一學者治學的方法、態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學術淵源、為學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說明，這對讀者來說，幫助自然很大。我這次撰述“顧氏學記”，便重視到這一點，將全書分為“綜述”、“分論”、“附記”三大類，每類中又各標小題，分篇闡說。很想通過這一次的整理編次，使有志讀書的青年朋友們，對顧氏學術，能了解一個輪廓。並且進一步學習他的刻苦鑽研的精神，來提高自己的勇氣；看到他治學規模的闊大，來矯正自己的偏蔽；不會是沒有益處的。

張舜徽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於武昌

目 次

序言	1
綜述	1
一 顧氏身世略述	1
二 顧氏著作簡介	4
三 顧氏学术趋向	10
四 顧氏学术渊源	12
五 顧氏治学的精神	19
六 顧氏治学的态度	22
七 顧氏治学的方法	25
八 顧氏年表	30
分論——顧氏在学术上各方面的成就	36
一 “小学”	37
二 “經学”	45
三 “史学”	56
四 “理学”	67
五 “詞章”	72
六 “經濟”	77
附記——顧氏生平論学取友的一斑	86
一 四十五岁以前的江南友好	88
二 四十五岁以后北游时期所結識的朋友	93
三 書札往还、未曾会晤的学者	99
四 相从請益的学生	100

綜 述

一 顧氏身世略述

公元十七世紀，当明清之际的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明代末年，外則滿洲貴族勃兴东北，日益强大，有叩关內侵之势；內則統治階級腐化无能，賦稅繁重，人民无法活下去。随着資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工商业者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趋于激化；接着由于土地的高度和集中和封建剝削的异常残酷，而爆发了李自成所领导的空前規模的农民大起义。滿洲貴族便乘机入关，从农民起义軍手中夺取了胜利果实，爬上皇帝的宝座。中国人民不甘受他們的奴役，在全国範圍內，广泛展开抗清斗争。这时便涌現出不少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爱国活动家，积极参加当时的人民抗清斗争，奔走呼号，抱守着“夷夏之防”的大义，来策划保卫沒有失去的領土。事虽失敗，始終不肯投降，或者銷声匿迹，深隱岩壑；或者变易姓名，出游天下，將他們在書本里鑽研所得和在游历中考察所得的一些知識，記錄下来，留供后人参考。特別是他們通过亲身感受，針对着明末政治上失敗的原因，在法制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良办法和主張，乃成其所謂“經世致用”之学。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并不算少，而顧炎武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顧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生於公元1613年，即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於公元1682年，即清康熙二十一年。他生長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們世代做過明朝的官。到他出生時，家道雖漸形衰落，但還保存了一部分藏書。特別是他的嗣祖顧紹芾，是一個關心政治留意時事的書生。顧炎武從十歲時起，便跟着祖父讀書，受過比較嚴格的訓練。祖父規定他每日除誦讀以外，還要鈔書；並指點他注意講求天文、地理、兵、農等實用的學問。暇時又有他的嗣母王氏講述許多歷史上民族英雄的愛國故事來鼓勵他。這些，都對他一生學術的趨向和多方面的成就，以及後來成為忠憤耿耿始終保全民族氣節的人物，無疑是有很大大影響的。

後來他的年紀漸漸大了，開始與社會接觸。恰逢其時，一般士大夫繼“東林”之後，又組織了“復社”，他便參加了這一政治性的學術團體，廣泛地和當時許多名士往來，講學論道，抵掌談天下事。他把科場應試看成無足輕重，進一步努力鑽研實用之學；於是發憤讀“二十一史”、“大明一統志”及各府州縣的方志。他經常自己慨嘆道：“感四國之多虞，耻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序）這兩句話，却吐露了他講求实學的志趣。從二十七歲起，便開始博綜群書，搜集明代以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和自然環境方面的材料。舉凡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的記載，無不勤加鈔撮。這不獨替後來寫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準備了豐富的資料；同時也奠定了他一生學術的雄厚基礎。

當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時，顧氏年才三十二歲。明年五月，清兵渡過長江，大肆屠殺。他前後勇敢地參加了蘇州起